

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发展的新动力与再升级

翟崑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区域国别学自 2022 年 9 月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后, 迎来包括体制机制、学术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全方位快速发展期。其中, 区域国别的智库建设, 尤其是高校的“区域国别智库建设”是重点之一。这就意味着, 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在经过 2012—2022 年的发展后, 将获得发展的新动力, 实现新的升级, 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区域国别学是实践之学, 强调学以致用, 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使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 只有系统协调体制机制、学术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关键内容, 才能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我国高校国际问题研究, 尤其是区域国别研究, 有服务国家战略的传统。1964 年, 国家在诸多高校成立的第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就是应国家对外战略之需而设。改革开放后, 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咨政功能趋于活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 伴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对外战略的进一步需求以及中国新型智库的大发展, 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进入自觉发展的新时期。2012 年, 教育部设立首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 2015 年教育部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 要求“努力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这些举措推动了高校区域国别智库的发展。2022 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后, 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又迎来更大的动力。

这意味着: 第一, 国家越来越认识到, 区域国别智库是将相关学术成果转化应用为应用成果的必要手段和主要渠道。第二, 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将在中长期内获得国家的政策支持、资源投入, 高校发展区域国别智库的积极性提高。第三, 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的成效成为本学科发展情况的重要评估指标之一。也就是说, 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的成效, 关系到学科建设的成败。第四, 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发展的动力, 是与区域国别学建设的体制机制、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

流等协同发展、相互助益的系统性动力。近年来，一些实力强、有特色的智库得到重点支持，成为中国高校区域国别智库的示范和中流砥柱。

二

尽管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在过去 10 多年取得长足进展，但相比于区域国别学的体制机制、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内容，仍是短板。主要表现为三大问题：

第一，如何解决高校区域国别智库研究人员规模小的问题。我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力量主要存在于几个大的系统，分别是高校、社科院、党校、部委、地方、军方、宣传、企业等。如果把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秘书处认定的研究中心视为发挥智库功能的机构，大概有四五百家，基本覆盖全国。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小，但多数研究中心为虚体，规模很小，总体研究人员不超过 2 万，而有些研究人员只做学术研究不做智库研究。另外，全世界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每个国家或地区仅有两个左右的智库在做相关方面的研究。而且，我国高校区域国别智库研究范围远未做到国别全覆盖，主要集中在大国、周边国家、地区主要大国、中等国家，缺少对一些冷门国家、小岛国、未建交国的系统深入和在地化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增一级学科在非 985 院校新设博硕士点少，鲜有本科专业设置，这也意味着该学科的后备人才蓄积能力较弱，难以向上述各个系统输送区域国别学研究人才。

第二，如何解决高校区域国别智库研究力量分散的问题。近年来我国高校区域国别智库的发展，优化了“北京（中央）—地方（特色）—边疆（周边）”的布局结构。但是，区域国别研究有很强的地方性、特殊性知识的属性，边界感很强，造成实际上的力量分散和难以协同。这主要是由两个壁垒效应造成的：一是天然屏障。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差异大，有进入门槛，天然就是小圈子文化。而智库研究，既要做具体的区情国情研究，也要做难度更大的跨区域国别、比较区域国别研究，因此能胜任之人也不多。长此以往，形成不同区域和国别的研究人员“互不破圈”的传统。二是机制壁垒。大学学科建制、学术共同体机制等造成的机制壁垒。比如，我国有不少全国性的区域国别领域的一级学会，形成一个个孤岛式共同体，较少往来，遑论协同。因此，如何形成区域与国别协同、不同体系的研究机构和智库机构的协同，是亟需解决的大问题。

第三，如何解决高校区域国别智库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弱的问题。高校不乏杰

出的区域国别问题专家，甚至可以说，最优秀的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专家主要集中在高校。但是，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存在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偏弱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我国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还普遍存在“能力-意愿”矛盾。很多高校发展区域国别智库的意识不到位，有的则是意愿很强但不知道该怎么干。二是高校的区域国别学服务国家战略的优势在于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以及人脉网络，而在为国家战略提供战略思想、区情国情、形势研判、动态分析、政策建议等方面智库研究能力较弱。三是高校区域国别智库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具备日常性咨询功能、严格的保密条件、较强的技术门槛，以及与“用户”的通畅关系和报送渠道等条件，而高校的学科管理体系与以上条件有诸多不适应的地方。

三

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的合法性、重要性和迫切性显著提升，其再升级需要各层级主管部门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扬长补短，系统推进。

第一，中央层面适时出台统筹协调全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指导性文件。建立跨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央国企、军方等多部门的协调机制。各部门应积极配合，建立与国家区域国别研究以及一级学科相应的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如设立各种人才专项；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等区域国别类课题指南和专项课题；鼓励部委在一些高校挂牌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建立区域国别类智库的管理体系和行业标准；建立独立的区域国别类期刊序列及其评价体系；建立全国性的交叉研究平台和一级学会；鼓励企业、社会组织 and 民间组织捐资或出资建立支持全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基金等。

第二，教育部层面适时出台统筹协调全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建立相关各部门、各高校、各平台机制、各种资源的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区域国别学的体制机制、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国际交流、智库发展等的协同推进；建立院系人事制度的双跨机制，共同使用资源和成果；增设区域国别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名额，建立高校与相关科研院所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创新区域国别学博硕士学位点申请机制，如高校间以及高校与科研院所联合申请博硕士学位点等。

第三，在上述顶层设计之下，制定区域国别智库的发展规划、行业规范、标

准体系以及评估和奖惩体系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将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经常性地组织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的研讨和培训等；高校加大对区域国别智库在政策和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制定智库工作评价体系；支持高校建立各种“破壁型”“打通型”“交叉型”区域国别智库共同体和网络平台，如建立小国研究、岛国研究、中等国家研究、地区大国研究的智库平台等；鼓励一些非985高校走“专精特新”区域国别智库的创新道路，百花齐放；鼓励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围绕国家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联合攻关等。

区域国别人才的知识结构、功能结构与能力结构^①

杨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亲自关怀和部署下，我国开始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设置和研究实践探索，但在官方正式文件中一直使用“外国（问题）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术语^②。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为全球大国并日益真正具备了塑造和影响国际体系转型、国际秩序重构和大国关系重组的能力，有关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生产的战略需求开始不断上升^③。在此背景下，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中央有关领导关于开展区域和国别研究工作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于2011年11月启动设立首批37家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并于次年4月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

^① 本文为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基于‘多语种+’和‘HAG+’理念的新时代全球治理卓越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110049）、2023年上海市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人文/文理交叉育人体系研究”、2022年度上海高校市级重点课程“国别区域研究经典案例分析”阶段性成果，其部分内容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4月25日第6版。

^②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相关情况可参见任晓《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其中，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宣部于1963年12月15日联合向党中央提出并获得毛泽东主席批示的《关于加强研究工作的报告》，通常被视为国家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一份关键文件，这份报告连同毛泽东主席批示被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3〕866号）转发全国，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同步成立。

^③ 杨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重构与中国崛起的世界知识保障》，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